

清实录江浙沪地区 经济资料选

（清）高士奇



9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毕勤朴

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

何泉达 选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崇明红卫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49,000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198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80515-196-2/K·26 定价 1.90 元

前言

“实录”之谓，意在遣辞造句，“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①一部《大清历朝实录》四千四百二十五卷，披帙散书，细微末节，不免斧辟刀削，存良去莠。然于大处，却斲雕为朴，无伤“实录”风骨，为治清史者推崇。

但是，此书毕竟简册繁巨，并且行世之本稀少，置放案头浏览一过已非容易，更况披沙拣金，觅善处而见宝。于是，择其大要，分门别类，归纳汇纂之举勃兴。其旨在广布要籍，在方便读者。诸如晚近付梓的以列朝系事之《清圣祖实录选辑》，以专题系年之《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以地区系年之《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等等。

《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则暨合以地区和以专题系年的编例所长，从四千四百二十五卷《大清历朝实录》中选录的十余万言，裨益研治有清一代江南地区经济史的学者，排解他们读《大清历朝实录》难，寻找一部《大清历朝实录》难上难的烦恼。

^①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二

时下，披露报端杂志的鸿篇，送往书局镂板的巨制，每以“经济”之类的题目纷纭。其中尤以地区经济史方面的文字倍受青睐。同仁邂逅，亦每以用心经济问题得批却导窾之妙而额手庆贺。一时间，不期而然乎“经济”，仿佛是对往日匮乏经济思想史学家或者经济史学家的“反思”。

确实，自古迄今，上下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有多少经世学者，切磋国计民生；在经史子集四大书目中，又有多少讨论经济思想的文献典籍。《通典》、《通考》以及正史《食货志》诸书，无不遵循《尚书·洪范篇》厘定的“民以食为天”的玉条，把田制、赋税列于首位予以讨论。他如哲学、史学、文学、诏令、奏议、诗赋、笔记，同样不乏富有经济思想的篇章，可谓“人”既累千累万，“书”亦浩如烟海。

然而，我国经世之学，一方面云蒸霞蔚景色迷人，一方面却因经世学者所研讨的范围过于广泛，举凡治国平天下的韬略，庶几政治、法制、经济、社会、教育诸问题，无不旁涉。于是形成了广博有余，集约不足的知识构架。因此，截止一八四〇年以前，还很少有称得上经济学家名号的凤毛麟角问世。这时，欧洲的经济学则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一六六二年，英国的威廉·配第发表《赋税论》，为贵金属即货币的价值下了“一个‘理论上的’定义”。^①从而揭示了劳动量决定货

^① 马克思，《〈批判史〉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页二五三——二五四。

币价值量的原理。嗣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对生产领域的研究和分析，则标志了法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开始。到得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所展现的深邃构思更表明：“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① 由是，经济学作为一门严密的学科，在欧洲蔚为壮观。

铁甲利舰，洋枪洋炮打进近代中国大门的前后，西学东渐，学术思想界大有激浊扬清趋势。朝野之间，首先肇端了精于泰西学问的李之藻，向明神宗朱翊钧进奏《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之后，又发生了清顺治间进士慕天颜作《请开海禁疏》及贺长龄、魏源、张鸿飞等相继推出十四种《经世文编》的事。如许文字，终究使烙上近代历史特征印记的中国经济学初具了规模。

掀起一代新思潮的经世学者，诸如冯桂芬、郑观应、邵作舟、陈炽、何启、胡礼垣、严复、张之洞、张謇、汤寿潜、梁启超等更竞相推波而助澜，纵风而止燎。他们嘈嘈切切，或发“经济”言论，或做“经济”文章。但是，这些呼变革之风，唤维新之雨的“弄潮儿”，毕竟没有脱变出经世学者徘徊于上下五千年，倘佯在纵横八万里的家法，况且同官僚政治又千丝万缕，可谓“秦医虽善除，不能自弹也”。所以，亚当·斯密式的人物在近代中国始终没有能造就。以研究此类佼佼者言论为主要对象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以主要研究昔日经济事实及数据为对象的经济史学家，自然因为源头稀有活水而成不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页一八一。

了江湖河川。

时代推进到了20世纪尾叶，站在当今立场，审视过往，尔后逻辑地再现从古走来的经济发展足迹，提供当今明镜，无疑是有意义的。显见，这项工程历史地落在了历史工作者肩上。但是，临溪而渔，何以得深溪而获肥鱼？酿泉为酒，何以得香泉而使酒冽？与人切磋琢磨，复归陋室面壁冥搜，不意柳暗花明，觉得抛弃前辈经世学者博而不约的流风，又将九州方圆，科学地划分成若干经济区域，随后以宏观者姿态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微观研究，或许可以事半功倍。《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的辑录，正是进行这种尝试迈出的第一步。

三

自唐末以下，江浙沪地区向为“国用所恃”。^① 称号唐代古文运动旗手的韩愈曾经留下话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② 无怪宋人常说：“自祖宗以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③ 欧阳修也黯然神伤：“江淮之民，上被天灾，下苦盗贼，内应省司之重斂，外遭转运之诛求，比于他方被苦为甚。”^④

后人多有评说，江浙地区赋重始于朱明，据上所述，其发轫无疑宋朝，甚至更早。它对后来的影响之深远，迨乎千百年而不衰，及至清世祖顺治帝执政，仍不得不承认，“江南

① 《东坡奏议集》卷九。

② 《全唐文》卷五五五《送陆徵州诗序》。

③ 《续通鉴长编》卷四六六。

④ 《续通鉴长编》卷一四七。

赋额较他省独重，百姓久称苦累。漕、白二粮与岁供绢布，其尤甚者也。”^①不过，“毕竟吴中百货所骤，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②

其实，这种以商人资本的运动所得利润来养家活口，甚至得以称富的现象，在江浙沪地区由来已久。只是值明、清以降，商人资本表现得更为活跃罢了。譬如历称军事要塞的温州府，在清代乾隆朝，竟也成了“闽、浙商贾丛集之地。”^③

放眼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国度从其萌芽，发展到替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商人资本兴风作浪的结果。因为，“它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攫取生产余额，而且是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生产部门依附于它。”^④正如马克思揭示的：“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⑤所以，“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⑥

既然商人资本在解体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导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既然如前所述，明、清以下江浙地区的商人资本已经表现得异常活跃，而且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页十。

② 《广志译》卷二。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六，页十三。

④ 《资本论》卷三，页三六九。

⑤ 《资本论》卷三，页三六五。

⑥ 《资本论》卷三，页三六三。

发展到了“居农之什七”，甚至达到裨益深荷苛重赋税额压榨之“民”不见“贫”的“一定的水平”，为什么西欧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创造了惊人的奇迹，而中国从萌芽到鸦片战争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整整用了四个半世纪，还依然处在萌芽阶段。显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不少从事东西方历史比较研究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者强调，东西方在发展资本主义进程中“迟”“速”如此之分明，政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严格地说，是一部汇集清代统治集团对这一地区经济问题实施政权干预的史料书。从这部史料汇集中，大可窥探政权在当初这个最有希望突破旧生产方式的窗口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借以蠡测政权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程中的作用。

前述学者认为，西方社会依重政权推行了“重商主义”，所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则因为通过政权，使整个社会在“重本抑末”的泥潭里打转，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陷于萌芽的范畴内蹒跚。

如果不是被陈词浸润，如果认真地翻检了原始史料，并且对此作了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思辨，那么，不难发见，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朝政权，并没有一般地反对商人资本。相反，在总的倾向上，它对商人资本所采取的态度，基调是积极的。这个事实，不仅反映于晚清时期从上层政治领域掀起的“振兴商务”、“试办商务局”，“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的“重商”^①热潮。即使是清初亦然。康熙三十二年二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页六。

月初一日，康熙谕大学士等的圣旨即是资佐证：

西安米价，尚尔翔贵。户部可招募身家殷实各省富商，给以正项钱粮，并照验文据，听其于各省地方，购买粮米运至西安发果，所得利息听商人自取之。如此往来运贩，待西安米价得平之日，但收所给原银，于地方大有裨益。^①

应指出，“商人资本的运动是 $G-W-G'$ ，所以商人的利润，第一，是通过只在流通过程中完成的行为获得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买和卖这两个行为获得的，第二，它是在后一种行为即卖中实现的。因此，这是让渡利润”。^②这种被“让渡”的“利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③在这样的“侵占和欺诈”中，“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④因此，它在封建时期“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⑤

对待这样的“掠夺制度”，康熙非但没有动用权柄予以压抑，反而由国家拨出“正项钱粮”招募“各省富商”，“运贩”粮食，且“所得利息听商人自取之”，国家只回收“原银”。这对商人资本的鼓励，当是到了何等程度。

对商人资本的鼓励，在清初不惟康熙一人，他的后辈乾隆亦步亦趋。我们可以顺手拈来乾隆在乾隆八年九月初五日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八，页五。

② 《资本论》卷三，页三六八。

③ 《资本论》卷三，页三六九。

④ 《资本论》卷三，页三六九。

⑤ 《资本论》卷三，页三七〇。

下的一道谕旨引以说明。其文见下：

自乾隆八年为始，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卖。……俾外洋商人，得沾实惠，不致有巢卖之艰。……并宣谕该国王知之。^①

当然，康熙也罢，乾隆也罢，他们对商人资本尽管采取扶持和奖惠的态度，但这丝毫不意味康、乾已经自觉地利用了商人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的解体作用，借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使旧生产方式导向新生产方式。他们的举措，只不过为了维持一统天下的政治地位，而不自觉地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连这样一点的“自觉”都没有，由此造成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过分脱节，那么，必将引起上层建筑岌岌可危的格局。一旦如此，对康、乾之流无疑致命。

既然康、乾青睐商人资本意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个政权就不可能不具有双重性。一重是，现存政权同旧生产方式互为适应，由此形成拖滞现存政权性质发生质变的传统惰性，对孕育新生产方式胚芽的排斥，从而表现出现存政权的顽固守旧性。一重是，对在经济关系中表现异常活跃的商人资本促进生产发展，导致解体旧生产方式的作用，网开一面，从而表现出现存政权的有限进取性。如此而矣，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展缓慢，归咎“政权”推行了一套“重本抑末”政策，明显不合中国历史实际。这个观点除本篇援引上述两条康、乾谕旨外，收录在《清实录江浙沪地

^①《清高宗实录》卷二〇〇，页五。

《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中清政府措置的有关数十条商业政策的史料更可予以充分说明。作如是观，带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症结究竟何在？我们的意见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为兑现这一统治思想所形成的一套官僚政治制度。

“民本”是中国一古老的统治思想。最初对它给予逻辑说明的是被称作《书经》的《尚书》。其中《五子之歌》篇对此概括为两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确实，安邦治国，首务是使芸芸众生“怀安”。然而，如何方可令“民”怀安定之心，居乐业之美？传统的措施是均平物质利益，使皇帝陛下的臣民无贫富悬差，无贪财欲念，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①因为，“富而不骄者鲜”。^②而“骄者”上可与朝廷分庭抗礼，分裂政权；下可惑乱民间淳朴之风，使之心往财物，更可兼并贫民，摇动邦基，颠覆政权。惟有“均平”，适可消磨欲念，稳定邦基。这样，“均平”物质利益的概念便移花接木在民本思想的内涵，从而使“民本”与“均平”合成为一体。但是，客观的经济规律不可能使人们的物质利益持平。于是，就有抑兼并、制豪强的政治措施和执行这些措施的行政机构应运而生。这类措施在政治实践中的兑现，大体上都起到了压抑生产向着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效应，从而使生产始终局限在“男耕女织”的框架而不得逾越。由是，造成经济进展的步履维艰。反映在《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中的众多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即可管中窥斑。

《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不仅为解颐中国资本主

① 《论语·季氏》。

② 《左传·定公十三年》。

义萌芽趑趄不前的原因，提供了翔实的原始史料。而且，又如实地记录了中国近代工业肇端的历史。譬如有关在上海招商试办“机器织布局”的始末，江苏扬州、泰州等处设立面粉公司“专利病民”的弊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动议向英国筹款三百二十五万英镑修筑沪宁铁路的事宜，等等。他如遍及中国城乡冲衢的“牙行”为什么时而受到政府的保护，时而又遭遇限制。凡此种种，在《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中尽可俯拾。无疑，这为研究和了解晚近中国的国情，尤其是江浙沪一带区域的情况，提供了有益的素材。

四

历代帝王，对“实录”的纂修无不郑重其事。有清一朝人主尤为认真。《清太宗实录》笔记清太宗皇太极回避史官的插曲，对此颇可印证。

天聪五年正月，一天皇太极踱步文馆，进入巴克什库尔缠直房，询问所修何书，回答：“记注上所行事”。皇太极礼貌地说：“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观”。并按定例马上退避。^①

在皇太极的表率下，《清太祖实录》等十二部以“实录”形式写成的当代史籍相继问世。它们成书的卷数和年代分列于后：

《太祖实录》十卷。崇德元年敕纂，康熙二十年重修，雍正十二年加校订。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八，页五、六十。

《太宗实录》六十五卷。顺治九年敕纂，康熙十二年重修，雍正十二年加校订。

《世祖实录》一百四十四卷。康熙六年敕纂，雍正十二年加校订。

《圣祖实录》三百卷。康熙六十一年敕纂。

《世宗实录》一百五十九卷，雍正十三年敕纂。

《高宗实录》一千五百卷。嘉庆四年敕纂。

《仁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道光四年敕纂。

《宣宗实录》四百七十六卷。咸丰二年敕纂。

《文宗实录》三百五十六卷。同治元年敕纂。

《穆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光绪五年敕纂。

《德宗实录》五百九十七卷。宣统时敕纂。

《宣统政纪》七十卷。民国时纂修。

清代各朝纂修的实录，依照规矩，定稿以后，分缮五部，每部俱有汉、满、蒙三种文本。但是，随着王朝式微，其中德宗朝实录只缮写了汉文两部，《宣统政纪》只缮写了一部。缮后的实录，按其装潢和开本差异，分辨为（一）“大红绫本”（皇史宬与“奉天大内崇谟阁”各藏一部），（二）“小红绫本”（乾清宫与内阁实录库各藏一部），（三）“小黄绫本”（藏于内阁实录库）。以上各本“实录”，历经天灾人祸，多有罹难。目前的存佚情况大致是：

（一）“大红绫本”

1. 藏于“奉天大内崇谟阁”的一部，一九三七年被“满日文化协会”组织影印时屡受挖改。从篡改的内容可以看出其用意大致有二。一是掩盖日本侵略行径。二是关系中、日、俄、朝等国的记载，经篡改，以利于日方。此本印后已残缺不

全。

2. 皇史宬藏本，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本太祖至高宗朝有残缺，其中世祖朝全佚。仁宗至穆宗四朝完整。德宗朝缺一至三七六卷。

(二)“小红绫本”

1. 乾清宫所藏一部，现归故宫博物院收藏。嘉庆二年，宫中失火，烧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实录原本。嘉庆四年，五朝实录据黄绫本补缮。因此，此本残缺较少，其中太祖朝缺九卷，太宗朝缺二十六卷，仁宗朝缺五卷，无德宗朝实录。

2. 内阁实录库所藏一部，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接收时，移交国民党政府文官处，现下落不明。

(三)“小黄绫本”

藏于内阁实录库，现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此本无德宗朝实录，太祖至穆宗十朝虽完整，但自嘉庆以后各朝，卷面颇多勾画改乙符号及待改正的浮签。

(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德宗朝实录》、《宣统政纪》的定稿本，完整无缺。稿面工整清楚，改动之处已粘贴整齐，极个别地方粘有待改浮签。实录正本即照此清缮。

除上述各本“实录”的存佚情况外，目前在国内外流传的，共有两种印本。一是如前陈述，是由“满日文化协会”依据“奉天大内崇谟阁”本(即“大红绫本”)组织影印，日本大藏出版公司出版，东京单式印刷公司印刷的影印本(简称影印本)。影印本共印三百部。另一种印本是台湾省于六十年代据上述本子翻印的缩印本(简称缩印本)。缩印本的质量较差。其中既有白页，又有错页；既有漏卷，又有错卷。但此本翻检十

分方便。这次，我们辑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所用的工作本，就依据此本。对本子中错、漏、白各卷各页，则依据影印本勘核补齐。除此而外，又将已辑录的资料，逐条逐字校对于影印本。当然，无论缩印本还是影印本，都不是一个理想的本子。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本子替代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按现有的条件工作了。

通览《清实录》且从研究的角度辑录有关资料，实非容易。有幸在方诗铭先生的督促下，以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的其他同志的关心下，历时二度春秋，终于将这件事情了结，不觉有释重负之感。轻松之余，想到自己学识浅薄，不免忐忑，因此，疏漏不备处，恳请大方指正。

何泉达 识

一九八七年初春

于沪上陋室

凡 例

一、本资料仍照《清实录》编年体编排。

二、《清实录》用年号纪年和干支纪日，本书除保留清代纪元，并将干支改为夏历日期外，又在括号（ ）内加注了公历时间。

三、《清实录》原有句读不甚准确，选入本书的资料一律重新断句，并且加上了标点符号。

四、对原资料中明显错字、漏字径改、径补。

五、本书选编的四百八十六条资料除一条例外，其余每条都注有两个出处。前一出处为日本大藏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的《清实录》本，后一出处为台湾华文书局根据上述影印本翻印的缩印本。

六、为方便读者，书后附有分类索引以备查阅。

目 录

前言·····	1
凡例·····	14
世祖(顺治)朝·····	1
圣祖(康熙)朝·····	5
世宗(雍正)朝·····	16
高宗(乾隆)朝·····	24
仁宗(嘉庆)朝·····	83
宣宗(道光)朝·····	95
文宗(咸丰)朝·····	126
穆宗(同治)朝·····	141
德宗(光绪)朝·····	158
宣统朝·····	192
分类索引·····	204